

名家访谈论坛

重建师范教育

——访顾明远先生 顾明远 郝文武 胡金木(1)

恢复全面发展教育的权威

——三评“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提法的讨论 王策三(6)

强化中国师范教育的特色和优势

——访谈加拿大和美国著名教育学家纪实 郝文武 任凤芹 郭祥超(29)

现代教育评论

洞穴隐喻与教师存在之迷思 曹永国(34)

董纯才对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传播和践行 宋荐戈(41)

教师教育理论

论教师培训供给侧改革的依据与思路 龙宝新(46)

我国教师教育政策研究热点的共词可视化分析 祁占勇 陈赵阳(53)

古来专论教师的文章甚少吗

——中国教育史上特有的“师说”传承现象探析 张礼永(62)

教师专业发展

教师的课程领导力:源泉、要素及其培育 杨 跃(67)

课堂学习研究与教师专业化发展 张 霄(73)

国际教育视野

师范大学和教育大学的理念:儒家教育学的启示 [加]许美德 任凤芹 译(79)

西部教育研究

海原县特岗教师结构变化的国家政策调整启示 王安全(86)

其 他

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北基础教育与教师教育

研究中心简介 (封二)

《当代教师教育》征稿启事 (封三)

师范大学和教育大学的理念： 儒家教育学的启示*

[加]许美德¹,任凤芹²译

(1 多伦多大学 安大略教育研究院,安大略 多伦多 M5S1V6;

2 陕西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基于儒家教育理念的视角,通过对欧洲中世纪大学、19世纪法国师范学校、19世纪美国 and 英国师范教育经验进行考察,追溯东亚师范学校和师范大学融入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发展的两种主要模式及其理念——日本教育大学和中国师范大学,多角度、多层次分析师范教育的价值观与儒家传统相互作用的方式,旨在解答“什么是高质量的教师教育”这一核心问题。

关键词:师范大学;教育大学;儒家教育学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087(2017)01-0079-07

收稿日期:2017-01-18

作者简介:许美德(Ruth Hayhoe),女,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教授;任凤芹,女,江苏连云港人,陕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博士后。

一、研究的历史背景

我很乐意有机会为《教师教育质量与变革:中西方比较视角》这本重要著作撰写一个章节。自1991年冷战结束已有二十余年,这个时期围绕着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取代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冲突的挑衅性论题,人们一直在争辩。支配冷战的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建设两种世界观的张力,虽然这两种世界观均起源于欧洲启蒙运动,然而西方世界最终意识到可以向其他文明学习很多东西。联合国将2001年定为“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年”,并成立了一个由知名学者组成的委员会来促进和引领这一对话,其中包括担任哈佛燕京学社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并曾任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和文明系主任、哈佛燕京社社长的杜维明教授。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对话年还见证了美国纽约“911”

恐怖袭击及其持续的影响。然而,别的且不说,最重要的是“911”事件更加凸显了与西方文明根源不同的文明间相互理解的重要性,这些价值观和思想在不同时期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并且必将坚持下去。它结束了趋同与普遍主义的假设,这两种假设标志着资本主义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叙事,并将“先进的”工业化国家视为所有其他国家应努力追求的质量标准。

这本书聚焦中西方比较的视角探讨教师教育的质量与变革,我想开辟一条反思之路,考察如何从儒家思想的角度理解教师教育质量,并考察从中国长期以来对教师与学习者关系和对人类进步最重要的各种知识的理解引发出来的教育学的意蕴。就变化而言,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的一篇文献指出,在东亚现代教育发展中,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存在着显著的持续性。这就构成了资本主义现代化

* 资料来源:许美德.师范大学和教育大学的理念:儒家教育学的启示[M]//李子建,克里斯托弗·戴.教师教育的质量和变革:中西方比较的视角.荷兰多德雷赫特:斯普林格出版公司,2016:215-229.本文翻译已获授权。

进程中西方调整教师教育制度模式的基础,其案例还有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和香港,同时,这也奠定了中国大陆和越南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基础。尽管在这六个各具特色的社会中,其教育结构和政策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但在教师、学习者和家庭发挥其作用的方式上却有着高度相似之处,这并不奇怪。

哈罗德·史蒂文森和其同事的开拓性研究表明,早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北美学者已经意识到从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可以学到很多。当今中国的飞速发展和中国儿童在国际教育成就评价(IEA)和学习能力国际评价项目(PISA)测试中取得的成就,越来越显著地证明在充满儒家传统精神的课堂中普遍存在的教学实践是有质量的,这种教学实践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丰富教师教育的方法,并有助于正在进行的关于改革的对话顺利开展。作为一直深知历史视角对于比较理解具有至关重要性的比较教育学者,我想在本章集中讨论20世纪处于发展的中国和日本教师教育体系变化的经验,并且确定西方和儒家价值观有效融合的方法,这些方法在教师教育的两种亚洲模式中日臻完善。这两种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使教师教育计划的卓越品质和崇高地位得以可能。其中,一种是在法国和俄罗斯仍然存在但在英美国家消失了的师范大学模式,另一种是东亚独有的已经传播到马来西亚和印度的教育大学模式。

本章首先对欧洲大学模式的核心价值观以及在这种模式中深植于知识结构方式中的质量观念进行回顾。话说回来,这与远早于欧洲大学的儒家教育模式及其核心价值观和知识结构方式形成鲜明对比。虽然儒家教育模式注定要在19世纪日本和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努力进程中消失,但欧洲大学尤其是由于洪堡得以重振的柏林大学,仍然是全球性的主导模式。最近,它被赋予“全球研究型大学”的形象,对于渴望在全球范围内衡量大学质量的主要排名体系中占据领先地位的学校而言,这是一个令人仰慕的目标。然而,从历史上看,这种模式并不会促进高质量的教师教育,其对教师教育改革所做的努力成为反对其主导价值的斗争的标志。

我们首先考察19世纪法国旨在为国家培养教师的师范学校的发展,接着反思19世纪美国和英国的经验。只有在法国,一个对教师教育给予最高重视的大学模式——高等师范学校才会出现,这一模式被1917年革命后的苏俄所采用。在东亚,追溯师范学校和师范大学模式融入现代高等教育体

系发展的不同方式是令人着迷的。20世纪不同时期来自欧洲大陆、美国和俄罗斯的影响,导致出现上述两种模式——日本教育大学和中国师范大学。

日本早期的改革经验深受欧洲模式的影响,师范学院和师范大学于20世纪中期建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占主导地位的美国影响排除了欧洲模式的观念,进而提出综合型大学的理念,紧接着,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将教师教育提升到研究生层次的国家。日本对美国影响的独特反应是教育大学模式,这将在下文作以详细论述。

对中国来说,早期的现代教育也借鉴了欧洲大陆的师范学校和师范大学的观念,而美国在中国南方占支配地位的影响促进了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综合型大学对教师教育的吸收和接纳。直到1949年革命成功并采用苏联模式后,师范大学在中国的地位才得以显著提高,并在中国高教系统的各个层次中发挥了主导型作用。目前,全球研究型大学排名体系掀起的热潮,使中国的师范大学及其在教师教育方面处于领导地位的优良传统受到威胁。不过,国家政策规定,它们必须保持其“师范”的身份并增强其在一个更开放的系统中的领导力,这使它们有机会反思这个模式的意义和所表征的教师教育质量。此外,随着中国文化外交活动的开展,世界各地已建立450多家孔子学院,这使师范大学有理由反思儒家传统的核心价值观,他们力图通过与50多个国家的大学、学校董事会和非政府组织合作,将儒家思想介绍给世界。

对日本教育大学模式和中国师范大学模式更好的历史性理解,是否有助于解答本章的核心问题——“什么是高质量的教师教育”?这两种模式的文化维度对当前围绕教学改革的争论意味着什么?如果读者有耐心追随关于比较教育改革的历史性反思,他们将得到这些问题的尝试性解答。第一部分展示了欧洲中世纪大学的肖像。第二部分描述了一张与前一部分对比鲜明的儒家教育的肖像。第三部分考察了法国后革命时代师范学校和师范大学的出现。第四部分反映了这种模式被吸收到英美教育现代化经验中的方式。第五部分转向东亚,分析在师范学校、学院和大学的形成过程中,师范学校的价值观与儒家传统相互作用的方式,重点关注法语单词“师范”与词组“师范”之间的共鸣,“师范”一词在日语中音译为“shihan”,在中文中音译为师范。最后,我们转向正在《课程研究杂志》中围绕儒家教育学的本质议题开展的丰富

辩论,这些辩论并论证了什么样的知识结构和模式可能使学生和教师之间的活跃和动态的互动成为可能,这种互动正如在具有永恒性的东亚教育经典著作、儒家四书之一的《论语》中所描述的孔子与他的门徒之间的对话。

二、欧洲中世纪大学

在许多方面,12世纪欧洲大学的出现是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他们的学术自由和自治的核心价值依靠中世纪欧洲的三个重要机构。从教皇和罗马天主教会那里,他们获得独立的法律地位和拥有财产的权利,这些都已经载入宪章,保护他们免受地方政府或教会权力的干扰。在民族国家存在之前,它们实际上是国际性的,因为宪章赋予了他们在各地进行教学的权利。由于拉丁语成为教学和学习共同语言,教师和学生因此可以随着大学在广阔区域内迁移而自由流动。

从中世纪手工业行会那里,他们获得了一个自治组织的模式,有权基于他们的知识和技能决定谁应该被接纳为成员。因此,他们几乎总是建立在商业城市中,在那里手工业行会促进了经济活动,使城市独立于支配乡村的土地领主的采邑。从修道院那里,他们继承了一种知识方法,强调文本材料的长期累积,而不注重与当地社会需求相关的知识的应用形式。

传统的医学、法学和神学专业,与语法、修辞和逻辑三艺以及算术、天文学、几何学和音乐四艺一起主宰了早期的大学。神学被视为科学的冠冕,并且希望将所有其他知识领域整合在一个学科等级制度中,这一制度将法律和医学置于基础文理学科之上。逻辑和理论知识比实践和应用知识更有价值。通过将数学应用于自然世界中的实验,现代科学出现了,随之固有的专业化倾向增强了。康德哲学在事实和价值之间的区分允许对自然科学和经济学、社会学、政治科学等新社会科学的发展进行广泛的探索。但它也增强了极为重视理论和知识的专业学科的倾向。

虽然大学以重要方式促进欧洲文明的发展,但仍有其局限性。直到19世纪末,大多数应用技术和工业教育已经在其他学校得到发展,但大学仍然是高度精英化的。尽管女性作为学生和教师在中世纪大学之前的修道院和大教堂学校非常活跃,但她们却被排除在大学之外长达近七个世纪。女权主义者争辩说,大学的客观主义、狭隘专业化的定

位和线性逻辑方法都产生于男性主宰的历史处境。

三、儒家教育

研究中国教育的著名历史学家托马斯·李指出,中国古典教育的目的是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和谐统一。《大学》以如下方式表达了这一点:“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种对道德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关注在东亚高等教育中一直被视为高度优先的事项,即使它在西方影响下发展新的知识学科并使西方大学模式适应自身国情。

这在中国古典课程的组织中反映出来,中国古典课程包括古典文学、历史、哲学和艺术四个主要学科领域,构成了科举考试的内容。所有其他科目,包括医学、数学、农学和工程学,被视为为社会福利而开发的技术知识。四个核心课程领域不是离散的,也没有被组织成体现欧洲大学课程特点的那种等级制度结构,它们围绕着“道”的核心概念进行了整合。“古典文学以文字表达道,历史学以行为表达道,而哲学家和文学艺术家则阐释了道的各种其他方面。”

显然,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教育是东亚课程传统中最受尊重的知识领域,作为一个应用的跨学科领域,具有为社会和个人利益服务的高度责任感。理论、专业和技术知识被视为儒家经典的应用社会知识的附属。在为青年人准备科举考试的官学和非正式学校或者书院中,教师和学生之间也培养了深厚的个人关系。唐朝的时候,来自日本、韩国、越南等遥远国度的学生,带回古典文学作品,将汉语文字体系的某些方面融入他们的知识传统,同时还有选择地模仿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模式。

对西方大学非常重要的学术自由和自治的核心价值,在东亚的制度传统中却没有相同形式。基于自身知识为人民和皇帝服务的学者型官员的重要角色表达了一种学术权威。在书院中也有相当多的学术自由,许多没有担任公职的学者多渠道整合新的多样化的资源来讨论、辩论和修订古典文学课程。然而,书院没有像宪章保护西方大学那样受到法律的保护,他们对政府表达批评的生命力和能力建立于学者个体的独立思想和强烈的社会良知的基础上。

科举考试旨在为帝国官僚系统选拔担任官员的学者,虽然女性没有机会正式参与科举考试,然而持续到19世纪的新儒家哲学的知识整合模式,与以不断增长的专业主义和价值中立信条为特征

的欧洲大学的发展相比,对于女性来说并不陌生。

有趣的是,正是这些特征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学不被认为是培养创立于19世纪的大众教育体系所需要的大量教师的合适机构,相反,需要一个对女性开放的、赞成整合和道德上明确的知识形式并为社会和国家提供直接服务的全新的机构。

四、法国的师范学校和师范大学

师范学校和师范大学这些术语来自法语,在法语中,“normal”意味着“确立一种道德标准或典范”。第一所高等师范学校建立于法国大革命几年之后的1794年,那时大学已经被废除,正在创建为共和国服务的新学校。国民议会通过的法令规定,在这个新学校中教授“将来要把教授道德和塑造年轻共和国国民心灵的艺术教给学生,以便培养公德和私德”。公民身份和道德发展是新学校的关键目的,开设的课程集中在阅读、算术、应用几何、历史和法语语法上。这和占主导地位的大学的传统专业以及使用拉丁语作为学习语言形成鲜明对比。学生毕业后回乡创办师范学校,在师范学校里,新建立的国家学校教育系统所需要的所有教师都可以按照在这所新学校中学到的方法培养出来。

最初的高等师范学校的存在时间很短,但法国28个学院或大学学区都积极努力建立男女同校的师范学校。这些平民化的学校对工人阶级的年轻人开放,并招募与年轻男性一样多的年轻女性从事小学教师这一新职业。他们的核心价值观与大学的核心价值观形成鲜明对比:强调教学实践而不是理论;与在大学培养的高度专业的知识学科相比,更注重在数学和语言等基础知识领域采用综合学习的课程;与在大学中伴随着自然科学声望上升而来的价值中立的趋势相反,承担着明确的塑造学生道德的责任;与大学的相对非人性化环境相比,更倡导师生情感和指导关系密切的教育环境,在大学里,学生可以跨越学校的边界自由选择他们愿意听的课程和讲座;与大学的学术自由和自治相比,更倾向于国家控制和专业问责;与大学的国际主义和服务于知识进步而不是地方需求的倾向相反,更具有为当地社区和国家提供直接服务的强烈责任感。

1806年,高等师范学校在拿破仑统治时期作为法国大学的一种而得以重建,这些造就高等精英人才的学校隶属于法国政府各部。这些学校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学生,并将学生培养成高级公务员。法国新高等教育体系中的这一要素可能受到

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的影响,科举制度在当时备受法国知识分子赞赏。高等教育融入国家官僚机构以确保为在现代化发展所需的所有重要知识领域提供高素质的公务员,这种模式在1917年革命后的苏俄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高等师范学校在法国依然作为一所最主要的大学而存在,19世纪在法国不同地区建立了其他三所高等师范学校。他们为师范大学创设了一种模式,在此模式中,一门课程既要强调作为大学课程核心的文理基础学科中的专业学科,又要注重教育作为一个多学科和应用领域,负责确保从儿童早期教育到高等教育阶段的卓越教学。然而,事实上,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等学校主要培养学者、科学家和大学以及学术型中学的教师,而将一般其他各级学校的师范教育推向了师范学院,不再顾及师范学校为之服务的其他各级教育。

五、英美师范学校的经验

克里斯汀·奥格伦对美国大量的师范学校的情况进行了动态回顾,这些建立于19世纪美国的师范学校借鉴了法国师范教育模式,旨在为迅速发展的国家学校教育系统培养教师。它们是第一批对女性开放的高等教育机构,其课程模式和教学气质的共同显著特征是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重任的承担、师生关系的培育、学科知识与教育实践的整合,上述这些都是法国师范学校的特征。然而,它们不提供学位,因此注定要在美国最早开始的教师教育学位水平升级的过程中消失。

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这些师范学校被大学视为“学院可怜的继子”。它们或者作为教育学院并入主要的综合性大学,或者升格为致力于教育和教师培训的地方综合性大学,但从未被授予师范大学之名。因此,它们无法抗拒大学在已经建立的学科中给予理论知识特权的倾向。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尽管在教育经济学和教育社会学方面做出巨大贡献,但仍然于1996年关闭的事实,反映出它脱离了芝加哥本地学校和教师实际的需要。

因此,他们一直努力进行不断地斗争,以便在下列两种需求之间进行平衡:一方面是来自专业的、理论的和国际定向的研究和教学的学术需求,另一方面是来自学校和学校董事会对于与当地需求相关的实用专业知识的需求。这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依旧存在,当时霍姆斯小组努力建立专业性的学校网络,密切联系一批能够为行动研

究和专业重振提供实践情境服务的学校。最近,奥巴马的力争上游计划激励各州实施更有效的问责制度,确保教师培养计划的优越性和有效性。

虽然英国所有教师几十年后才达到本科毕业层次,与美国类似的模式可以在英国的经验中看到。尽管师范学校这一术语从未被使用过,但在某些情况下,与之类似的独立的教育学院被纳入主要大学的教育学院。其他一些教育学院发展为高等教育学院,为职前教师提供学士学位课程以及其他艺术、社会科学和各种应用领域的非学位大学本科课程。教育学院中许多已发展为成熟的大学。伦敦大学教育学院能够保持领先的地位,主要由于它在伦敦大学联盟中的独特地位,后者赋予它一个完全成熟的教育大学的自主权,并使其能够为高层次教育研究以及小学和中学教师的职前培养和在职培训制定一系列标准。

对教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学术化日益增长的政治关注,以及大学计划越来越偏离学校实际需要的趋势,为确保其相关性而导致采取了一些相当激进的举措。政府颁布了教师专业培训课程必须满足的标准,并发布了一系列初任教师的任职资格认证条件。成立了教师教育认证委员会(CATE)来监督这些举措的实施,并就教师专业准备的发展向政府提供咨询建议。1993年,教师培训机构(TTA)取代了教师教育认证委员会(CATE),继续从事教师任职资格的认证工作并作为一种重要渠道发挥作用,通过这一渠道,大学和学院可以获得资金以便为教学提供专业教育。

虽然新老大学仍然保留教师培训的责任,但所有课程在获得下一阶段合格认证和资助之前必须满足教师培训机构(TTA)严格的专业和实践要求。教育计划的众多现场服务和专业培训都需要在中小学开展,并使学校对专业准备工作的这一方面的设计和管理负有极高的责任。这项倡议表明为确保评估实践、整合教学、指导和社会责任等而采取了一种相当激进的方式,这一方式恰好是被重新带回到大学教师教育计划的前教育学院的特征。

伴随着“师范学校”和“师范大学”这两个术语从英美学术话语中消失,教师教育目前在美国、英国和其余使用英语的地区正在成为综合性大学的责任。大多数讲英语的人不了解“normale”在法语中的原初含义是“确立一种道德标准或典范”。当他们看到该术语时,他们可能将其理解为“常规的或者正常的”。只能希望这不会妨碍人们寻求理解

师范大学在中国背景下、教育大学在日本和更广的东亚背景下所取得重要成就的兴趣。

六、日本师范学校和师范大学的经验

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上半叶,日本已经设立了大量的师范院校来为其现代教育体系培训教师,这对于它的经济崛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些师范院校受到欧洲模式尤其是法国和德国模式的影响,在高度中央集权体制下为小学和学前教育培养了一大批训练有素的教师。随着二战后被美国占领,日本深受美国模式以及美国倡导的民主化和分权化的强力影响。作为一个结果,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个要求教师必须都是由本科毕业生担任的国家。在此背景下,日本高等教育进行了重组,把一些原来的师范学院整合为大学的教育学院,其余的则被发展为非常侧重教育的地方层次的大学。

其实,日本采取的是一种开放的教师教育模式,允许各级各类的大学,包括公立和私立的、全国性和地方性的,为教师的职业发展提供课程——只要它们能够得到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批准就行。与此同时,对中小学教师资格认证权力还是掌握在地方管理部门手中。他们从大学毕业生中挑选出最优秀的学生,然后通过竞争性考试决定他们在学校的岗位。由于教师属于公务员,享受公务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因而成为极具吸引力的职业。

和美国一样,日本主要的全国性大学不再举办培养了大批中学教师的学术性很强的教育学院,而地方性的大学在开设社会科学、文科和环境研究、妇女研究等新兴跨学科领域的同时,着力于把教育作为一个主要领域。这类院校培养了小学和学前教育的大部分教师。它们的许多毕业生也在本地社区与教育相关的领域中工作,因为仅有一小部分毕业生才能通过竞争顺利当上教师。这些地方性大学被称为“教育大学”(kyoiku daigaku),这个术语在西方世界很少使用,可以视为日本的发明。据一位熟悉这些学校起源的学者说,20世纪50年代,美国教育顾问强烈反对使用“师范”(shihan)一词,因为战前师范学校被认为在培养过度的民族主义时承担责任,这导致日本在东亚的侵略。日本对美国这一观点的回应是创建教育大学,而不是效仿美国地方性综合型大学模式。

地方和区域的教育大学承担着制定教师职业高标准的特定职责,同时能够保留一些师范学校的价值理念,即注重专业实践、密切联系当地社区及

一系列综合的跨学科知识领域,如环境研究、社区发展、妇女研究及成人与终身教育。这些教育大学知识渠道涵括了所有小学和初中的课程。此外,教育领域开发出多种服务方式,除了为正规教育服务之外,还服务于一些其他的机构和组织,这些机构和组织为人们提供培训、终身学习和成人教育服务。因此,这是一种与主要的综合性大学迥异的模式,是一种由儒家知识传统的元素所支撑的模式。

七、中国师范学校和师范大学的经验

像日本一样,中国发现欧洲师范学校模式非常适合于为早期现代学校培养男女老师。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初期,欧洲和日本的综合影响导致师范学校的大规模发展,这为那些无力承担高等教育高昂学费的农村贫困家庭的年轻人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其中一些被称为高等师范学校,很少一部分发展成为成熟的师范大学。北京在1922年成立男子师范大学,在1924年成立了女子师范大学,这两所大学于1931年合并,于日本侵略期间迁至兰州。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模式影响日益增强的南方,许多升格为大学的师范学校成为综合性大学,最有名的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它于1921年成为东南大学的一部分。

北京师范大学虽然只得到国民政府相当微薄的支持,但到了1949年革命胜利后,因为苏联的影响而独立发展。到了1950年初,又有五所全国性的师范大学于主要行政地区成立,此后在中国教育发展中发挥了重要领导作用。同时,每个省都建立了一所师范大学,在地区一级建立了旨在培养幼儿园和小学老师的师范学院和师范学校。

尽管深受国际英美高等教育模式的巨大影响,中国教育部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做出保持和进一步发展师范大学的果断决策。近年来,中国的医学和工程学的专业学院,纷纷被合并进更大的综合型大学,但六所重点师范大学中仍有五所保留了原名并进一步巩固了在教育领域的领导地位。虽然不允许它们与大学的工程学或医学等领域进行合并,但鼓励它们就近合并教师继续教育学院、小学和幼儿园教师教育学校,以提高这些课程的学术和专业水平。它们不但为幼儿至高等教育各层次的学校培养教师,还独领风骚于其他教育领域的发展,包括成人教育、终身教育、职业教育,甚至还包括公共管理、媒体和艺术等新领域。这是除了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主要课程外,在商

业、管理和IT等领域新增设的课程。这都大大拓展了法国背景下师范大学的原有模式,并给予教育领域以更大的使命和更高的威望。尽管有些学校迫于领导的压力将学校改为综合型大学(综合性大学在英美世界会被更好地理解),但这一决定有利于维持和提升师范大学模式,这源于国家领导层认为教育对中国在全球知识经济中的成功至关重要。我认为它表达了寻求这种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怎样更好符合中国深层的儒家精神的意识。如前所述,法语中“normale”这一术语在中国意解为“师范”(shifan),它唤起了与儒家知识传统的深层联系。

在中国通过孔子学院项目走向世界,并委托孔子学院发展其大学与世界各地的一系列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时,师范大学可能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除了消极、从众、死记硬背和过分尊重教师的负面刻板印象外,当许多学生进入全球高等教育领域时,促使他们学习成绩优异、有更强的动机并成功适应的深层价值观是什么?在儒家教育传统中优化学习过程的进一步的可能性是什么?

八、儒家教育学的启示

在本章的最后一节中,我将介绍一场关于儒家教育学的性质和运用的可能性的持续辩论,儒家教育学在本卷中作为对教师教育对比性讨论的一种启发因素而存在。教育大学和师范大学作为致力于教师教育项目有效组织的有特色的亚洲制度模式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我会就相关原因提出若干想法,以此结束本章的探讨。

在一篇题为“解释、自主和转型:跨文化语境下的中国教育学话语”的颇有争议的文章中,颇具影响力的中国语言学和语言教育学学者吴宗杰描述了中国传统经典教学方式的两幅截然相反的图景——一种是通过西方认识论的和分析性的假设的遮蔽,这些假设已经成为一种未被质疑的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另一种是通过儒家学习者和教师直接从《论语》中获得的。吴先生描绘了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早期儒家学习者学习自主性的图景,在《论语》中将这个学习者的情况生动地描绘为内心具有愤的状态,同时向外显现出表达强烈的愤的状态的面部表情。这是一个开始与教师对话的学习者,丰富了包含内在转变以及对外在世界更深理解的知识增长的愿景。这是一个学习者的景象,他们的言语只是一个工具,通过它可以清楚地洞察到无名的整体,这是我们所生活的可理解的宇宙。吴先生认

为,这种学习的品质和精神在推动 20 世纪中国教育发展的西方现代认识论的遮蔽中已经完全丧失了。他用当前国学课程的实施情况说明了这一点,其中文本被认为是遵循与西方语言系统相关的线性逻辑的脉络,在符号系统内建立的一系列命题。

吴先生的文章引起一群应邀给予评论的资深学者的热烈回应。一部分学者提出三个关注点:早期儒家传统的连续性,道家对语言与思想或理解之间关系的洞察是否比儒家存在更多的问题,甚至是一种根植于中国早期教育经典中的中国教育学复兴的愿望。另一部分学者认为,早在西方影响塑造中国课程和学习模式前,中国著名的科举考试制度的僵化已经扼杀了儒家教育学的创造力和独特性。

吴先生应邀对关于他的有新意的作品的各种评论做出最终回应,他的文章“在圣人的地方演讲”直接通过对八股文的评价来分析 19 世纪末以来科举考试问题,不久这一考试系统本身于 1905 年被废除。在论文中,他主张教育学可被视为一个意义生成的过程,教育目的主要是建立一种语言而不是知识,使得学习者可以践行圣人的话语和行为。他继续评论说,这可能是用来构建与东西方过去产生共鸣的新的教育学的理智的工具。

吴先生随后通过对 19 世纪成功考试的评价,阐述了中国考试传统要求学生运用经典建构意义的方式。那些 19 世纪成功的考试模式强调通过学生评论文本的能力呈现意义的深刻性。这不亚于对经典的一种微妙改写,使人复述过去以理解现在,或用更简单的话来说,“我注六经,六经注我”。汉字“文”可以理解为纹理、图案或者织物,代表语言的文本和视觉意识,“指涉内心感觉到的最深的

可理解性和清晰度”。因此,儒家教育学包含了心灵、身体、精神和情感的整合学习,这种学习比真理的命题或逻辑陈述更深入,并培养一种为家庭、社区和世界的利益服务的强烈责任感。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读者可以多从精神和道德灵感维度,少从命题真理的维度反思阅读圣经的经验,也要反思在与儒家礼仪习俗有许多共鸣的基督教礼拜环境中重复礼拜祈祷和阅读的做法。

我希望关于中西方教育学方法互动的简要讨论将会激发读者在《课程研究杂志》探讨这两个问题的转化。还要指出的是,在东亚发明并从那里传播出来的教育大学模式中,其课程中的知识组织所以可能比全球研究型大学课程中的知识组织更有利于这种教育学。它强调以社会利益为导向的应用知识,强调与儒家传统相呼应,将学科知识与理解人类发展过程(包括道德和美学理解以及认知能力)相结合的趋势。起源于 18 世纪法国的师范大学在当代中国呈现出新的形式,可看作综合了中西方高等教育课程特征的整合体,以多种方式支持这种儒家教育学的元素并丰富当前关于教学改革的辩论。

最后,让我结合个人自身经验来表达对于吴先生文章的思考,中国汉字“文”不是作为能指或概念而是作为生命轨迹的词语,而《论语》则可被视为世界上儒家思想的足迹。对于基督徒来说,通过阅读福音书追随基督在世界上的足迹的相似经验可能比以后由教会权威所建立的神学命题重要得多。因此,来自东西方的这些文本可以被看作滋养“美德的呈现,学习的心灵和对所有知识的关心”的互补方法。

[责任编辑 张淑霞]

The Idea of the Normal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Implications for a Confucian Pedagogy

(Canada) Ruth Hayhoe¹, Trans. REN Feng-qin²

(1 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Toronto ON M5S1V6;

2 School of Psychology,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Shaanxi)

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nfucian pedagogy, this paper via investigating the educational experience from the medieval universities of Europe, the French normal schools in nineteenth century, and the American and British normal education, traces back to the two main modes and their idea of the normal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of East Asia developing in modern higher education system—Japanese education university and Chinese normal university, this paper intends to conduct a multi-level and multi-angle analysis of the mode of interaction between normal education values and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in order to answer the key question: “what is a high-quality teacher education?”

Key words: normal university; education university; Confucian pedagogy